

# 江苏淮安楚州区河下遗址龙泉窑堆积瓷片研究

霍华<sup>1</sup> 陈锦惠<sup>2</sup> 郝明华<sup>3</sup> 韩建立<sup>41</sup>

(1、3、4. 南京博物院江苏南京 210016

2. 淮安市楚州博物馆江苏淮安 223001)

**【摘要】:** 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河下遗址堆积坑出土了大量龙泉窑青釉瓷片。研究发现,少量瓷片生产于元代晚期,其余的生产于明洪武到成化初期。青釉有青绿、浅青等 11 个色阶,造型有碗、盘、炉等至少四十余种,其中有龙泉窑明代官器。此批瓷片的出土,再一次说明了明代是龙泉窑的又一个发展高潮时期,对研究明代漕运以及楚州区历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关键词】:** 明代龙泉窑青釉瓷 楚州河下 漕运官器

**【中图分类号】:** K876.3 **【文献标识码】:** A

龙泉窑是中国古代著名窑场,一般认为,其北宋始烧,南宋鼎盛,清代停烧。以往对龙泉窑的研究多着重于南宋和元代。2006 年以来,随着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掘,明代龙泉窑研究出现了热潮<sup>[1]</sup>。2008 年 9 月,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河下古镇在开挖河道的工程中,发现了一处龙泉窑瓷片堆积坑,出土了十余吨瓷片<sup>[2]</sup>。这批庞杂的龙泉窑残片如何分类?它们为何会以堆积的形式出现在楚州?它们是何时遗物?研究这样的残件堆积坑,意义何在?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对这批瓷片作分析研究,并提出初步的看法。

## 一 河下遗址龙泉窑瓷片堆积坑(以下简称堆积坑)出土器物概况<sup>[3]</sup>

### 1. 器类

堆积中出土龙泉窑残片的器类可分四种:

第一种,能复原的器类,有碗、碟、高足杯、盘、盏、盏托、炉、小执壶、釜(茶具)、瓶、花盆和罐等 12 类。

碗,根据数量的多少依次有侈口碗、敞口碗、荷叶式碗(仅 1 件)、小菊瓣口碗和碾碗(仅 1 件可复原)5 类;根据口沿、腹部和圈足足端造型的差异可分 14 种造型。碟,分弧腹碟、折腹碟两大类,有侈口弧腹碟、敞口弧腹碟、侈口折腹碟 3 种造型。盘,有敞口盘、折沿盘、凹折沿盘三大类,分敞口盘、菱口折沿盘、圆口折沿盘、圈足凹折沿盘、小花口敛圈足凹折沿盘、圆口敛圈足凹折沿盘和卧足凹折沿盘 7 种造型。盏,分圈足盏、卧足盏两类,共有唇口圈足盏、侈口圈足盏、束口圈足盏、束口浅腹圈足盏、敛口卧足盏、直口卧足盏、束口卧足盏 7 种造型。盏托,有台阶孔盏托、漏斗孔盏托两种造型。高足杯,分斗笠

**作者简介:** 霍华:(1956~)女,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古陶瓷。

陈锦惠:(1955~)男,淮安市楚州博物馆副馆长,主要研究方向:古陶瓷。

郝明华:(1954~)女,南京博物院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考古绘图。

韩建立:(1957~)男,南京博物院馆员,主要研究方向:考古器物修复。

---

式高足杯、弧腹高足杯两类，其杯把有直把、竹节式把（1~4节不等）、上敛下丰圆台式把之别，分别与两类不同的杯体相配。炉，分圆腹炉、鬲式炉、筒式炉三类，有撇足圆腹炉、管足圆腹炉、蹄足圆腹炉、鬲式炉、筒式炉、八卦纹樽式炉 6 种造型。小执壶等其余器类仅 1 种造型。

第二种，器形可辨、无法复原的器类，大致有象兽足炉、镂空绳纹耳炉、双耳瓶、镂空象耳套瓶、洗口瓶、玉壶春瓶、梅瓶、洗式炉、竹节樽式炉、觚、过笼、大盖罐和小盖罐等十余种器形。

第三种，可复原的器盖，有 3 种造型，至少大、小两种规格。

第四种，无法辨明器形的有灯、镂空器残件、塑像底座等。

## 2. 胎、釉

胎，可分为灰白胎、浅灰胎、灰胎、深灰胎 4 种。

釉，可从两方面观察，其一釉色，其二釉的质感。釉色至少有青釉、淡青绿釉、青绿釉、青灰釉、淡青灰釉、冬青釉、青黄釉、茶黄釉、翠青釉、浅青釉、青褐釉等 11 种。但并不是每种器形都具备这 11 种釉色，以碗、碟（彩插一：4）和高足杯的釉色最丰富。还有粗釉，它不是一种釉色，而是一种釉面现象，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釉面有窑伤，另一种是埋入地下后，釉面严重受沁而失光。有的器物两种情况同时出现（《发掘简报》图十七）。另外，还有生烧状态的釉。

釉的质感有三种状态：第一种是同一种釉色有两种质感，例如，青灰釉，有釉质玻璃质感强、釉面多开片和釉质润泽、一般无开片两种质感；第二种是一种釉色只有一种质感，例如，淡青绿、青绿釉一般都不开片，釉面匀净，釉质如玉般润泽，明代龙泉窑官器的釉都是如此；第三种，茶黄釉、青褐釉的釉面都开片，玻璃质感强，且釉色不匀净，质量一般的民窑碗盘多为此种釉。

## 3. 装饰

瓷器的装饰工艺可分为釉装饰、彩装饰和胎装饰。堆积坑出土的残器中，阴纹多于阳纹，大多数阴文印花残片的釉面开片；相反，大多数阳纹印花残片釉质润泽有玉质感，釉面极少开片。最精美的是阳纹印花大盘残片，花叶的凸起面有层次感，边沿凸起高，中间凸起浅，但是凸起的程度高于纹样的地子部分；相应地，釉的厚薄不一，釉色也有深浅，凸起部分釉薄，釉色相对浅，反之釉色深。具体到纹样，花叶的边沿最白，中间釉色稍深，地子釉色最深。在釉伤以外的部位可以看到，釉色以青绿和浅青绿釉为多，釉质温润有玉质感，釉面极少开片，印花纹饰有层次感，釉色、釉质和纹样均较其他残件精美。

阳纹印花的模子是阴纹印模，阴纹印花的模子是阳纹印模，在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中出土了印花模<sup>[4]</sup>。明代早期的 157、158 号两件印模是阴纹印模，225 号是阳纹印模。两件阴纹印模花叶的边沿部位最凹，中间部分稍微凸起，地子平面最高，与上述阳纹印花纹样的情况正好相反。这种阳纹纹饰是时代特征，或是明代永乐至天顺时期官器盘独有的特征，亦或两种情况皆有，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一//青釉印花花卉纹刻花鱼纹残盘底(08CHD(4):887)

在残片的纹样中，最有趣的是一件民窑残盘（08CHD(4)：887），底心的花卉纹样模糊不清，釉面有缩釉点，但是在旁边刻有一条造型十分率意的鱼，鱼嘴微张，体态摇曳，应是陶工的即兴之作（图一）。

#### 4. 工艺

##### (1) 关于碗、盘、碟的质量

依据胎、釉和工艺质量的高低，堆积坑出土的碗、盘、碟可分为四等，依次为：一等品——造型有碗、碟、菱口盘等，胎色为灰白或浅灰色，釉面润泽，不开片纹，釉色一般为青绿釉和淡青绿釉，纹样优雅独特，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青花瓷及故宫博物院旧藏龙泉窑碗盘相类似（彩版 1~3）；二等品即一般民窑器——胎色多为灰色，釉面开片纹，玻璃质感强，釉色多样，以绿釉为多（《发掘简报》图八）；三等品——多为元代民窑粗碗，灰胎或者深灰胎，釉面开片纹，釉色普遍灰暗，多为青灰釉或者浅青灰釉，内外壁多为凸印花卉纹；四等品——炉窑中产生的废品，如叠烧的碗、盘，窑伤严重的器物等。四等品与一等品造型基本一致，有些四等品虽然釉质和釉色与一等品一致，但有釉伤（图二），如青绿釉粗釉的侈口碗、敞口盘、敞口碟。值得注意的是，折沿大盘的釉面严重失光，都属于四等品。



图二//绿釉粗釉大盘官器残件(08CHD(4):1775)

## (2) 关于釉裹足

通过对四个等级的碗、盘的胎、釉、造型、纹样和工艺特征进行分析比较,可发现釉裹足工艺、裹足釉的厚薄、圈足内是否有釉这三个特征是区别堆积中碗、盘时代的重要依据。粗碗均非釉裹足,足端平切,圈足中间一般都有小乳突点,为元代器物。官器和一般民窑器的碗、盘都是釉裹足工艺,大多数为明代产品。在江西高安元代窖藏<sup>[5]</sup>、内蒙古集宁路元代窖藏<sup>[6]</sup>和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sup>[7]</sup>元代地层中出土的元代大盘、碗、碟也有裹足现象,但是裹足釉都比较薄,而且大盘的造型与堆积中出土的釉裹足大盘不同,为菊瓣式。

圈足的造型特征历来是器物类型学和古瓷鉴定中的重要元素,足端平切还是圆浑,内足墙竖直还是呈斜式,也是一般瓷器鉴定中判定器物时代的依据之一。例如,明洪武时期,景德镇窑碗、盘的时代鉴定依据之一就是足端平切,内足墙呈斜式。不过由于窑口不同,这一鉴定标准并不适用于龙泉窑碗、盘。堆积坑中出土的明代碗、盘,由于釉厚,往往影响到圈足和口沿的造型。以圈足为例,胎的轮廓相同,施釉以后的轮廓线则不一样;由于遗址中绝大多数遗物是残片,故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一现象。现分析如下:

先看胎的轮廓,釉裹足碗、盘的圈足足端基本都是平切状,内外足墙平直。但是,罩釉以后由于釉层的厚薄不一,圈足足端大致呈现出四种状况:第一种,足端平切,足墙直,这是由于裹足釉薄,多见于民窑粗器的碗、盘;第二种,足端圆弧,足墙直,这是因为施釉较薄且均匀,民窑精、粗的碗、盘均呈现这一特征;第三种,足端呈外斜圆弧状,外侧圆浑,内侧有棱角,内足墙直,这种圈足的釉较厚;第四种,圈足基本呈现浑圆的势态,裹足釉较厚且均匀。上述第三、四两种现象一般出现于官器和民窑精品碗、盘。以上都是明代龙泉窑碗、盘圈足造型的时代特征,均不见于其他窑口。

## (3) 关于碗、盘底足的涩圈和釉点

据《发掘简报》所述,釉裹足碗、碟底足的施釉状况大致有九种情况<sup>[8]</sup>(《发掘简报》图五),这些施釉状况与器物质量等级有规律的联系。例如,一等品(官器)碗、碟的圈足有内心全釉圈足釉点整齐、内心全釉圈足釉点不齐两种状况,三等品民窑碗、碟多呈现内心涩圈圈足涩圈、内心涩圈中间釉点圈足涩圈的特征,二等品民窑碗、碟各种施釉状态都有。

## 二 堆积坑出土瓷片的性质与时代

### 1. 堆积坑中龙泉窑瓷片的时代——元代至明成化时期

#### (1) 文献记载

《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十四“陶器”条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sup>[9]</sup>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年）逝于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十七日，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年）旋即即位，以第二年（1465年）为成化元年。据《明宪宗实录》卷一记载，成化皇帝在天顺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发布的《即位诏》中令：“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sup>[10]</sup>因此，根据文献记载，堆积坑中出土官器瓷片的时代是明代天顺时期。

### （2）与元代窖藏、明初纪年墓和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器比较

元代可以与龙泉窑堆积瓷片相比较的资料有江西高安窖藏和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窖藏出土龙泉窑瓷器。堆积中出土的碟残片中有部分与这两个窖藏中出土的龙泉窑青釉印花碟<sup>[11]</sup>同类。另外，粗釉双耳衔环瓶（《发掘简报》图十七）按照瓷器鉴定惯例也应是元代至明天顺年间的器物。

将河下遗址龙泉窑瓷片堆积中出土的龙泉窑残器与下列纪年墓葬中出土的器物相对比，可以发现其胎、釉和工艺的基本特征基本一致，这些纪年资料有：江苏南京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初大将薛显墓出土的龙泉窑青釉碗<sup>[12]</sup>，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初大将张云墓龙泉窑青釉盏<sup>[13]</sup>，永乐十六年宋晟夫人叶氏墓龙泉窑青釉盘<sup>[14]</sup>。例如，08CHD(4):356（足径11.5厘米）和08CHD(4):354，青绿釉印花宝杵纹折沿盘残底，虽然仅存盘底且尺寸较小，但其纹样亦与叶氏墓中出土的龙泉窑青釉印花宝杵纹基本相同，且青釉润泽如玉，不开片纹，隐圈足<sup>[15]</sup>，无疑是元代晚期到明永乐时期的遗存。所以，堆积中有元代到明代永乐时期的龙泉窑青釉器。再如，堆积坑中出土的明永乐官器中的莲子碗（彩插一：1）、罐、筒式炉、菱口折沿盘、侈口盘、高足杯、盖罐、菱口盘和盏托等等与枫洞岩窑址中出土的明代早期、中期的器物类似<sup>[4]</sup>，虽然有些碗、盘内心花纹的题材有异，但这不妨碍对堆积瓷片的时代判断，因为两者的时代风格一致。所以，堆积中有明代早期到中期的龙泉窑青釉瓷器。

### （3）标本测试结果

堆积中出土的瓷片，有8组119件瓷片送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核分析实验室测试。测试结果显示：“通过8种不同器型青瓷胎釉化学组成的分析和数据统计处理，可以清晰地将8组样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元末至明天顺时期烧制的青瓷碗，即第1组，第二类为第2~6组5种不同器型，第三类为凹折沿花口盘和圆口盘，即第7和第8组样品。由于第一类与第二、三类的瓷胎化学组成存在综合特征差别，将第一类即第1组样品定为元末的产品，第三类凹折沿花口盘和圆口盘为元代末至明代早期的产品，第二类是明代早中期的产品。”<sup>[17]</sup>

## 三 河下遗址龙泉窑瓷片堆积的历史地理缘由

如此多的元明龙泉窑残片在淮安市楚州区出土，跟楚州区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原为县级淮安市。它位于苏北平原中部，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灌溉总渠和淮河入海水道平行横穿东西，京沪、宁连、盐徐高速公路贯穿境内，全区人口120万，总面积1510平方公里。

楚州区地理位置优越，水网密集，是江淮流域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青莲岗遗址所在地。据《淮安市志》记载<sup>[18]</sup>，战国时楚国向东扩张，将这一带并入楚国范围，这是2000年楚州区命名之起因。南朝齐永明七年（489年）在此设淮安县，“淮安”之名始见，自此，淮安（今楚州区）一直都是历代郡、州、军、路、府的治所所在地。淮安（今楚州区）不仅是秦至民国时期苏北地区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漕运和盐运枢纽，素有“七省咽喉”之称。明清两代淮安府和漕运总督府的府治皆设于此，河下古镇是江淮一带的重要商埠，民间设在河下地区周围的各地会馆多达二十余家，如浙绍会馆、江宁会馆、陕西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等。楚州区当时称山阳县，此名一直沿用至民国初年，1914年更名为淮安县，20世

---

纪 50 年代以后亦然，辖属淮阴专区。1986 年，淮安撤县建市，更名为县级淮安市。2000 年，原地级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县级淮安市撤市建区，更名为楚州区。

楚州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辖区内各类名胜古迹不胜枚举（参见《发掘简报》图一），基本建设工程中常有文物出土。1986 年，当时的淮安市（县级）就已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

据文献记载，明洪武元年（1368 年）在当时都城（南京）附近设立转运使机构，总管漕运，并且在淮安（今楚州区）设立分司<sup>[18]</sup>，这是最早的漕督衙门。明永乐初年陈瑄出任漕督，当时又称漕运总兵，正二品衔，率 12 万军队，专门负责漕运。至明景泰二年（1451 年）始设漕运总督于淮安<sup>[18]</sup>，全称为“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与总兵参将同理漕事。

今楚州境内的“运河”在地图上有两条（《发掘简报》图一），据《淮安市志》<sup>[18]</sup>，地图上标明的楚州段的“京杭大运河”于 1959 年开拓。开拓运河工程中，因为里运河穿过当时淮阴城内，开挖出土不便，于是在里运河以西另挖新河，称为“大运河”；地图上在楚州段改向的“里运河”是明清时期的古运河，在楚州区境内长度为 35.8 公里，系由邗沟演变而成。里运河在河下古镇的湖嘴街巷口由南北流向变为东南-西北流向，此处的御码头遗迹（《发掘简报》图一：9）是当年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在淮安（今楚州区）驻蹕下船之处。明代洪武至天顺时期，龙泉青瓷运到杭州后，由运河运至今楚州地区，经过拣选的官器由位于今楚州的板闸钞关<sup>[22]</sup>进京，民窑器也在这里集散，运往各地。经测量，堆积坑的东南角南距京杭运河楚州段城河街出口处仅 450 米，应该是方便倾倒由运河而来的在淮安（今楚州区）拣选出来的龙泉窑残片的。

## 四 河下遗址龙泉窑瓷片堆积中的官器与漕运

### 1. 漕运与宫廷用瓷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是利用河道和海道调运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方式，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利用漕运将由田赋征得的粮食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黄仁宇先生在《明代的漕运》第五章“宫廷供应品的漕运”中谈到朝廷所需瓷器也由漕运进京，并且多次提到这些供应品“从淮安运来”<sup>[23]</sup>。虽然书中没有提到龙泉窑，但是从文献记载中可以明确看到<sup>[10]</sup>，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至天顺八年（1464 年），饶（景德镇）、处（龙泉）等府为宫廷烧造供用器皿，处州的官器于天顺八年“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堆积中出土的官器残件中，所有官器都有窑伤，有些为废品，还有少量窑具和叠烧残件，结合“烧完者照数起解”、“违者罪之”的记载判断，出现这种情况的合理解释有两种：一种是龙泉在此之前生产的官器，包括窑址中自明洪武朝始的历朝官器废品，一并运到了淮安（今楚州区），废品就在淮安（今楚州区）挖坑掩埋；另一种是明天顺八年后龙泉窑官器经淮安（今楚州区）进京这件事到此为止，将此前拣选的官器废品集中堆放掩埋。需要解释的是，打碎掩埋是明代官器残次品的一贯处理方法，景德镇明代御窑厂一直如此处理，因此，堆积坑中不少官器残片上有明显打碎痕迹（图三）的现象就不难解释了。



图三//官器残片上的打碎痕迹

## 2. 漕运关税的管理官员与督窑官

清代御窑厂的督窑官分为两级，分别为总理和协理<sup>[25]</sup>。御窑厂的总理由漕运总督府管理税务的官员担任而遥领窑务，协理官驻厂主管生产。清雍正、乾隆时期著名的督窑官年希尧和唐英，曾经先后在位于今楚州区的淮安板闸钞关管理税务时兼任御窑厂总理。为了方便督窑，唐英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调任九江关管理关税并监管窑务<sup>[26]</sup>。关税与督窑一统，可见总理督窑官的重要性。

清代御窑厂制度是承袭明代而来的。前引明成化皇帝的《即位诏》中亦透露出两条信息：一是龙泉窑的官器生产由中官管理；二是烧造官器之事重大，违者判罪。这里虽然没有说明官员督窑的具体地点，但是明确说明朝廷在处州府的窑务有官员监烧。那么，也有可能是遥领窑务，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的话，根据清代督窑官的设置惯例倒推，明代遥领龙泉窑窑务的督窑官应该由朝廷设在淮关的官员担任。结合堆积中出土有官器残件的情况，可以初步做出如下判断：位于今楚州区的淮安板闸钞关是龙泉窑官器进京的必经之路。

## 3. 堆积坑中出土官器的特征

堆积中出土官器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釉色、釉质、纹样和造型方面。釉色以青绿釉为多，基本不开片，特别润泽，虽为残器，其质感仍然呈现出民窑碗盘所不具有的玉质感；碗盘腹部有缠枝花卉纹，内底纹样多为阳纹花卉纹，以牡丹花为多，纹样层次感强。造型为宽折沿大盘、菱口折沿盘、碗和高足杯，宽折沿大盘的复原口径在30厘米左右，菱口折沿盘的口径有22厘米左右、25厘米左右和30厘米左右三种规格。大多数官器釉面有窑疤，但是，大盘底厚重的胎，窑疤以外如玉般润泽的釉面和阳纹的层次感，使得器物极为华丽，例如天字款印花牡丹纹残盘（《发掘简报》图四：1；彩插一：5）。官器的釉色、釉质和纹样一般有固定的搭配，如《发掘简报》图四：10的纹样在碗和高足杯上都使用，此类器物的外壁都有四瓣或者五瓣刻花大莲瓣纹，且都为青绿釉，釉质极润泽且不开片。

根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核分析实验室的测试报告，明代瓷盘胎和釉料的主量和微量化学成分存在诸多相同之处，

其微量化学成分数据的 PCA 分析结果没有揭示出官器和普通瓷器的不同特点，这虽然说明了官器与民器时代的一致性，但是无法说明两者的质量差异。进一步将细微差异的化学成分重组数据进行 PCA 分析，终于实现了官器青瓷与普通青瓷的划分，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微小的差异<sup>[17]</sup>。这些数据不仅是判别龙泉窑青瓷官器的科学参考标准，也为肉眼可以观察到、但是无法精辟描述的官器釉质感和纹样的艺术魅力产生之原因做出了科学的解释。

笔者判断的官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造型有样板、釉质好的官器有粘连或者有窑伤，例如，青绿釉刻花花卉纹敞口盘（彩插一：2、5）的圈足内有粘连痕迹，但是它的纹样风格与景德镇御窑厂出土的明宣德萱草纹盘<sup>[28]</sup>有异曲同工之妙，纹样印花的线条与枫洞岩窑址出土的永乐官器刻花牡丹纹盘<sup>[4]</sup>相一致；另一种情况是变形或者有窑裂的残器，这一类器物，除了造型具有官器特征外，用湿布将釉面蘸湿以后，可以清晰地看到官器所拥有的特殊纹样（图二~四）。



图四//龙泉窑印花西番莲纹大盘残底(08CHD(4):357)

#### 4. 堆积坑出土官器与故宫旧藏龙泉窑器的比较

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旧藏龙泉窑器中有的器物与官器在釉色、釉质和造型上有相似之处<sup>[30]</sup>。堆积坑出土的官器都是废品，有的虽然面目全非，但是除去粗釉的特征外，官器在造型、纹样上的风格依稀可辨。粗釉印花花卉纹圆口折沿盘（08CHD(4):1349），方圆唇，宽折沿，平底，弧腹，圈足，足端圆浑，外足墙微微内敛；隐约可见缠枝花卉纹；灰胎，胎体厚重，质地坚致，有糯质感；釉质粗糙；釉裹足，中心有釉斑，刮釉形成涩圈环，釉的边线不整齐。复原口径 30.5、底径 18、高 9.6 厘米（《发掘简报》图十：1）。这件折沿大盘是废品，造型、纹样都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级品清宫旧藏龙泉窑青釉花卉纹折沿盘一致。青绿釉印花番莲纹大盘残底（08CHD(4):357），圈足，胎体厚重，釉质十分润泽，盘底内心印番莲纹（图四）与台北故宫收藏龙泉窑青釉番莲纹折沿大盘<sup>[31]</sup>底心的纹样一致（图五）。釉裹足，中心有釉斑，涩圈环边线不整齐。复原底径 18 厘米。

## 五 余论

前文所引《即位诏》还透出一条重要的信息：至明天顺时期，龙泉窑仍在内官的督造下为朝廷生产官器。从堆积坑中出土的实物资料看，确有一部分残件的造型、釉色、釉质、工艺与民间流传的龙泉窑瓷器不同，透露出官器的风格。例如，彩插一：3 的菱口盘与《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瓷器》中的第 120 号明中期青釉刻花菱口盘完全相同，且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否则，《即位诏》中“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的记载何以理解呢？当然，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还有待于更多资料的发表。

总之，明正统至天顺时期的龙泉窑官器是值得继续研究的课题。

## 六 结语

综上所述，明洪武二十六年起，龙泉窑开始为宫廷烧造青瓷，大约于天顺八年结束烧造。今楚州河下古镇是龙泉窑产品的集散地之一。明洪武元年开始，淮安（今楚州区）设有专门督办漕运的衙门。堆积坑所出的龙泉窑精品，应该是当时专门为朝廷生产的官器，由漕运渠道运至淮安（今楚州区）拣选剔除的次品。

通过对河下遗址龙泉窑瓷片堆积中出土的瓷片进行研究，初步得出四点结论：

### 1. 堆积坑出土瓷片的时代

通过将堆积坑中出土的龙泉窑瓷片与有确切时代、地层的出土龙泉窑器物对比，推测其时代为元代至明成化时期。

2. 明代龙泉窑是龙泉窑发展史上又一个高潮阶，精品的釉质如玉般莹润；可描绘出的碗、盘、碟的内底团花纹样七十余种；碗、盘圈足至少有 9 种不同的工艺，它们为研究元明时期龙泉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资料。



图五//龙泉窑青釉番莲纹折沿大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 堆积中的大多数瓷片是一般商品，少量器物为进贡宫廷而生产的官器，由位于今淮安市楚州区的板闸钞关进京，推测它们在当时漕运总督府所在地——今淮安市楚州区拣选时，因质量差被废弃。它们是此瓷片堆积的重要价值之所在。

### 4. 堆积中出土瓷片为研究明代早期龙泉窑器

---

物、明代漕运历史、淮安市楚州区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资料整理负责：霍华

参加整理人员：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的郝明华（器物绘图）、韩建立（修复）、韩强（摄影），淮安市楚州博物馆陈锦惠、张弛，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学生黄一村、张剑，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学生吕行人（纹样绘图）。

###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于2009年3月22日举办了“琢瓷做鼎碧于水——大窑龙泉窑发掘成果暨元、明时期龙泉窑精品展”开幕式和研讨会，同时展出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明时期龙泉窑藏品；浙江省博物馆于2009年6月举办了“大窑龙泉窑发掘成果汇报展”；台北故宫博物院于2009年1月25日~10月11日举办了“碧绿——明代龙泉窑青瓷展”。

[2]本文仅讨论楚州区河下遗址龙泉窑瓷片堆积中出土的残器。参见本期《江苏淮安楚州河下遗址龙泉窑瓷片堆积坑发掘简报》，本文中简称《发掘简报》。

[3]参见本期《发掘简报》图十~十五。

[4][16][2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物考古学院、龙泉青瓷博物馆编：《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瓷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图第157、158、255、102号，第82、90~92、120、121、123、130、142、145、146、148、168、169、184、192、221、222号，第102号。

[5]金成编著：《高安元代窖藏瓷器》，朝华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

[6]陈永志主编：《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图第78~83号，文物出版社2004年。

[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龙泉青瓷博物馆编：《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瓷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

[8]九种情况为内心全釉圈足釉点整齐、内心全釉圈足釉点不齐、内心全釉圈足涩圈、内心涩圈圈足釉点整齐、内心涩圈圈足釉点不齐、内心涩圈圈足涩圈、内心涩圈中间釉点圈足釉点整齐、内心涩圈中间釉点圈足釉点不整齐、内心涩圈中间釉点圈足涩圈。

[9]明·申时行、赵用贤纂修：《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十四“窑冶·陶器”条，《续修四库全书》第789~792册，影明万历内府刻本。

[10][24]明·孔贞运：《皇明诏制》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457~458册，影明崇祯七年刻本。

[11]刘金成编著：《高安元代窖藏瓷器》，朝华出版社2006年，第144~153、156、160、161页；陈永志主编：《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图第78~83号，文物出版社2004年。

[12]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两座明墓的清理简报》，《华夏考古》2001年第2期。

- 
- [13]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唐家凹明代张云墓》,《考古》1999年第10期。
- [14]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7》(江苏·上海卷),图第170号,科学出版社2008年。
- [15]徐军在《从枫洞岩窑址的发掘试析元明龙泉青瓷分期与特征》中谈到,这种隐圈足出现于元代中晚期,很快成为元明时期的主流盘型之一。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瓷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 [17][27]李丽、冯松林等:《江苏淮安市楚州区淮城镇河下遗址出土龙泉窑古瓷的核分析研究》,待刊稿。
- [18][19][20][21]淮安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淮安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概述”节,“大事记”第15页,“大事记”第16页,“河流”第97页。
- [22]今楚州区的淮安板闸钞关遗址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 [23]黄仁宇:《明代的漕运》第五章“宫廷供应品的漕运”,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35~165页。
- [25]总理和协理官不是官职,而是工作性质。总理和协理官的官职级别不定,唐英于清雍正六年到景德镇协理窑务时的官职是内务府员外郎。
- [26]傅振伦、甄励:《唐英瓷务年谱长编》,“雍正十三年”、“乾隆四年”条,《景德镇陶瓷》1982年第2期。
- [28]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等:《皇帝の磁器——新発見の景德镇官窯》展览图录,第35~38号。
- [30]黄卫文:《清宫旧藏明代龙泉窑“官器”的相关问题研究》,本期第46~51页。
- [31]蔡玫芬主编:《碧绿——明代龙泉窑青瓷》,图版第32号,台北故宫博物院2009年。